

“香港文学”散步的教学实践 ——兼谈城市面貌的展现策略

Teaching Practice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Walking— On the Presentation Strategy of the City

陈慧宁*

Chan Wei Leng

摘 要：“香港文学散步”由卢玮銮教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提出，并出版了《香港文学散步》一书，希望通过文学景点实地考察，推广香港文学。“文学散步”的理念在于读者身体力行，直观感受文学的现实场景，加深对作品的认识。在殖民混杂的多元文化城市中生活，可以令我们从置身城内远望开始，又从那里回顾，往往在探索这座隐喻的城市过程里，彰显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城市面貌”的界定可针对文学事件的发生现场、文思泉涌的创作现场、文化形成的酝酿现场而设。完整的文学情境就在身处的环境中，只要亲自接触，就能激发起学习兴致，强化学习动机，而长期的观察、思考、是培养创作力的基础。“走出课室”势必要结合区域资源，可开启学生对生活所在地的历史、地理、人文、自然的关心与兴趣。“文学散步”画面虽握着城市的框架，但框架只是范围，范围可以扩大、突破、千变万化，最后也可能被固定。透过活动构思的探索、挖掘及整理，才能让城市的人文思考范畴充分展现魅力。

关键词：香港文学，文学散步，城市面貌，教学策略

Abstract: “Hong Kong Literary Walk” was proposed by Professor Lu Wei Man in the early 1990s and published the book “The Walk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which hopes to promote Hong Kong literature through field visits to literary attractions. The idea of “literary walk” lies in the reader’s ability to do her best, to visually feel the realistic scene of literature, and to deepen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ks. Living in a multicultural city of colonization can allow us to start from a long-distance look inside the city and look back from there, often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this metaphorical city, highlighting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The definition of “city face” can be set up for the scene of literary events. The complete literary situation is in the environment, as long as personal contact, can stimulate the interest of learning, strengthen the motivation of learning, and long-term observation, thinking, is the basis of cultivating creative power. “Out of the classroom” is bound to combine regional resources,

* 陈慧宁，香港树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助理教授。Email: dorocwl@yahoo.com.hk

can open up students' concern and interest in the history, geography, humanities and nature of the place of life. Although the “literary walk” pictureholds the frame of the city, but the framework is only the scope, the scope can be expanded, breakthrough, ever-changing, and finally may be fixed.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excavation and finishing of the activity idea, the city's humanistic thinking category can fully show its charm.

Keywords: Hong Kong Literature, Literature Walk, City Face, Teaching Strategy

一 前言

地理空间包含了故乡、居住地或一个曾经令你难以忘怀的地方，而当然也可以是一个提供你自由舒展、挥洒生命的领域。而正因为这些空间曾和我们的生命发生了深刻的互动，故而或不知不觉地孕育出情感，或已产生特别的意义，而被我们的心所深深认同，在我们的记忆中扎根茁壮。而根据卢玮銮的文章《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指出，1985年是讨论“香港文学”的高潮是基于历史原因（小思，1998）。香港作为殖民与被殖民的城市，从一种更深层的意义来说，是一个被宰制的关系，但被宰制者不一定毫无办法改变现状。殖民历程不因为旧的殖民者离去而完结，反之，遗留下来的问题才逐渐浮现出来，作为大都会城市，为了避免民族主义论者把香港视为西化而无视香港实际复杂处境，八九十年代开启的一系列研讨会议和文化评论者在就是在香港的本土空间之内，检视及反省种种的文化现象。“香港文学”对于城市的书写，有别于其他城市，置身于空间环境的布局，商厦民宅的设计，商业味道和潮流文化与民生息息相关，提供给作家无限想象的可能。

二 城市“文学散步”概说

以“散步”二字标举于文学之后，初义是凸显文化思想与文学作品的完成过程中，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因为散步或有起讫，却无规矩，偶然适志，更可随前代文人生活漫游亦步亦趋，并对作家创作的环境气息欣赏赞叹。从事“文化香港”、“香港文学”教学者期望养成学生对香港小区的好奇和关怀，通过实地考察加强对课堂所学知识的感受和理解。

“文学散步”带动思考，在城市中穿梭，感受城市的每一行走的景点。“城市面貌”的界定可针对文学事件的发生现场、文思泉涌的创作现场、文化形成的酝酿现场等而设。藉由“某种散步”的预设，于当中一览与文学作品相关的人、地、时、事、物。以“文学事件的发生现场”、“文思泉涌的创作现场”、“文化形成的酝酿现场”这三项粗略的分类，实际探讨时可能会相互重迭，可能仅就某一类单独讨论当然也可能有别于三者之外的聚焦。

2.1 文学事件的发生现场

此处“文学事件”指的是文学作家经历的创作事件内容。叶灵凤自三十年代离开上海之后，便没有再创作小说，写作以散文为主，特别以书话见称。（卢玮銮，1998）来港之后他继续担任副刊编辑，在香港沦陷期间替日本人主编《大众周报》、《新东亚》等杂志，曾惹来汉奸的指责，但战后有证据显示，叶灵凤其实身负搜集日本人情报的秘密任务。五、六十年代，叶灵凤做了大量关于香港历史和掌故的考证（结集为《香港的失落》、《香岛沧桑录》、《香海浮沉录》等），写过香港地区动植物的文章（结集为《香港方物志》）。这些文章见证了叶氏由“南来避难”到“香港本位”的转移。（董启章，2018）

香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的迁徙以及他们各自选择不同的创作道路，形成独特的文学类型，产生了香港文学在现当代中文文学的特有意义。三四十年代成名的作者，移居香港后仍继续著述，作品亦有变化，上述举的叶灵凤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小思（卢玮銮）著述的《香港文学散步》于1991年出版，内容主要介绍几位中国著名文人学者在港活动的场所及他们在港的故事。及后于2000年，当年的教育署（现在的教育局）邀请小思带领二百多人游历书中的地方，并记录下来，成为香港文学发展中重要的一次跨媒体活动。就是介绍他们曾在香港活动的场所，并附以有关的故事，指出香港在华文文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位。

研究叶灵凤（1905~1975）、许地山（1894~1941）、张爱玲（1920~1995）、戴望舒（1905~1950）、徐吁（1908~1980）、李辉英（1911~1991）、姚克（1905~1991）诸作家，不能忽略香港时期的著述。除了文学创作，还有翻译、论述、杂文、影视编剧，足以令新文学研究者，重新思考过去现当代文学划分的界线（如1949年作为分水岭）、重新反省过去纯就文本或以政治社会文化讨论文学的方法。诸位作家创作的内容，往往是反映当时社会现况的各种面向，撰写的动机则多是“不吐不快”。作家若就自己生活周遭发生的人事为主题描写，则与“文思泉涌的创作现场”密不可分。

2.2 文思泉涌的创作现场

所谓“创作现场”是旁及文人对自己写作环境的描述。有些作家可能因为创作环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创作结果。例如某个作家书写香港街道，而街道就是一本书，而我们每天生活在这个城市，行街浮游，有知道有不知道，书写是一种向他人和历史分享的方式，点滴聚成本土。如也斯（1949~2013）的《也斯看香港》这本摄影集，描写了香港九新界不同景点和街道的面貌，把以前的香港风情面貌详细描写出来，包括香港以前的兰桂坊跟现在的有什么不同、以前的又一城跟现在的有什么不同、还有以前的大澳风景是怎样描写出来，给读者呈现出一面旧香港的样子。

因应不断发展的城市，触觉敏锐的作家，尝试以新的笔调反映对时代、社会或人生的真切感受，而新的文学观念创作技巧，也为香港文学，特别是小说提供新的景观，如报章杂志专栏的特色，认识专栏杂文和香港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及“后杂文”的概念。副刊专栏是否文学作品，过去有不少讨论和争议，这类商品化味道、有时限、有框框和

字数限制的短而精的文体，是“香港报刊的专栏杂文是香港文学最大的特色。”（黄维梁，1996：页6）者普遍认为香港“副刊的功用与作者的学养不无关系，由专栏文字认识作者对事物的看法，且关心的是现下所见所感的事情，特别容易引发读者共鸣。”

（刘绍铭，1995：页15）诚如新生代作家韩丽珠针对香港目前发生的“占据机场”的示威社会现象，在副刊专栏一篇〈城市的皮肤〉，描述机场就像是城市的皮肤，提供庇护所的功能。只有在机场，示威者才可以安全地对外来者诉说一个关于这城市的，家不成家，同时走投无路的故事。（韩丽珠，2019）专栏的文学性或许并不彰显，其价值与作者的学养亦不无关系，但我们可从中看出香港文学的多元与生活化的特色。

2.3 文化形成的酝酿现场

南来学者钱穆（1895~1990）、唐君毅（1909~1978）、牟宗三（1909~1995）、徐复观（1904~1982）等人为代表的新儒家哲学家，以“中华文化，花果凋零”为憾，在海外尝试传承儒家哲学思想，用力办学，如在桂林街、农圃道创办新亚书院，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他们主要对香港这个城市并不特别介入或参与，但在思考儒家哲学思想时，亦因身处香港五六十年代的变化，不得不同时思考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的关系。张爱玲以学生身份在香港大学的生活，《烬余录》留下对香港的印象，为创作多了一份殖民地色彩。萧红40年代在香港流亡期间，有了较平静的书写环境，完成了对童年故乡回忆的经典作品《呼兰河传》。她们曾经短暂逗留的地方，为香港文学增添了优美的格调和对这个城市留下与众不同的眷念与意义。

三 “香港文学”散步与城市面貌的展现

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1870~1945）常在京都若王子神社与银阁寺之间散步，思考人生，后人将这条沿小川迤逦的小径称为“哲学之道”。此道位处京都市北边，白川疏水旁的沿水小径，起于若王子神社终于银阁寺。据说，明治期的京都学派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爱好在此散步沉思，故以此名之。

新儒家牟宗三晚年在农圃道新亚研究所讲学，家就在隔了一条街的靠背垄道的唐楼。“智的直觉”道德的延续或许就在新亚院中的圆亭完成（现址新亚中学里的圆亭富有特色，是新亚诸先生讲学会友之地）。香港的繁华闹市阻挡不了哲学家的儒道情怀。

近几年，一些机构推出小区写作班，以香港、九龙和新界的具体实存街道为核心概念，发动小区考察研究及城市建筑面貌，再辅以小区创作班，让市民大众整理自身与居住环境之间的关系，处处重建的年代，以文学书写，留住自己的街道与建筑，绘画文艺小区地景。为了引发学生表达所见所感，教师以香港城市图片引起动机，着学生谈谈香港城市景观，从而认识看似平常的香港公共空间，可提供的书写内容或角度甚多。

当然，在城市文本划出某几条文学散步路线，或会令读者忽略多元文本的其他潜藏“刺点”，无意间为香港制造了刻板模式（stereotype）。这不是固定的在地图上标示一条散步路线，只是期望有更多都市漫游者（flaneur）能够纪录他们的散步路线。每条

路线或偶然经过或重复行走，表现当事人思考抉择的过程。一位散步者将没有既定秩序的城市刺点纳入秩序，这城市的刺点，将之包含在建筑砖墙或街道石阶，目的是在多元意义中建立单一意义，例如小思（卢玮銮）将旧建筑化为文学地标，当多位散步者在做相同的事时，便将散布城市的“点”以不同方式连贯，不同的“线”又交织出多元的思考秩序。她说散步时，沿路往往会经过无数可游可览的景点——跟文学未必有关，但顺道去逛逛，也可对社会多些了解，扩而言之，可称文化散步。（小思，2009：页203）这种的散步行径，在在提高无目的的目漫步步行的乐趣与层次，反而深化了城市的文化厚度。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的都市漫游者与普罗大众相距似近还远，如幽灵在城中漂泊，他们所行的路不依常规，以不同方式串连城市建筑，对照出日渐单一的大众行走路线。班雅明认为在拥挤不堪的人流中漫步，“张望”决定了他们的整个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文人正是在这种漫步中“展开了他与城市和他人的全部的关系”。

“他通过游手好闲者幽灵似的身影集结在像室内一样的街道，街道的出现很难与煤气灯分开。”他以作家串连城市建筑的煤气灯为喻，描述单一行走路线的茫然。（班雅明，2010：页116）在香港这座商业城市，政府的无形规划往往限制市民的行动方向，大型棋盘式土地分区、高速干道、集体运输系统。香港的新发展区域（如将军澳新市镇、西九龙填海区），街上不只缺乏有趣多元的路边活动，市民甚至终日逗留在室内活动。小思在戴望舒一节，引用他的〈香港的旧书市〉，文章重现戴氏于六七十年前，在中区小街散步淘书的记忆，这正是近年街道设计、城市管理不能孕育的氛围。〈山居杂缀〉记述戴氏搬入半山“林泉居”生活，唯有散漫舒缓半退隐的心态，才有闲心内感繁扰的城市发展（纵使已经比今天安静得多），怎样令他失去“傍晚徐徐的散步”，只剩下“空虚的路，寂寞的路”（小思，2009：页73）。小思带我们闲逛的路线，除了少数如六国饭店、浅水湾畔等地之外，都是远离闹市之地，不妨视为在既有城市管理下另辟蹊径，重绘一条较为“另类”的路线，发掘更多未为人熟悉的城市刺点。

四 香港城市面貌展现的教学策略

考察香港作为城市的文学系谱，往往是寓言化故事为多，西西以降的创作正是如此。新一代的香港作家，偏爱将城市作为隐喻和寓言来书写。他们创作受傅柯提出的异质空间（heterotopia）概念影响，藉以强调城市的混杂性。从地名、物质性名词之间找寻香港的城市趣味，前者从空间的意义指涉比较复杂。如春园街、雪厂街、爱秩序道（由当时驻港英国少校的名字翻译而来）、通菜街、西洋菜街等街名，在董启章的《地图集》中成为主角。后者可以陈冠中的小说《金都茶餐厅》，透过食物讲述了很多港式菜色。

4.1 “物”的教学构思

4.1.1 西西《飞毡》为香港历史的记述，其中不少是香港本土的记忆。作者虽说“肥土镇”子虚乌有，但小说述说的事物，日常而亲切，在在勾起人们的记忆。西西的

《飞毡》，处处可见与现实生活互相呼应的情节，以《飞毡》第一卷中的选段《茶楼七部曲》、《照相馆》、《左邻》、《右里》，宜于展示一些有香港时代特色的怀旧物品，分享对物的感受，如小说中一些早期事物或物品，如荷兰水，又叫汽水，除了解旧日香港的社会面貌，也藉以揣摩作者对香港昔日生活的情感。

4.1.2 “饮食”经验应该是所有人所必然的成长经验，从饮食文学中，可以分析出许多成为文学要素，也可以成为包装的文学产品。成长中的饮食经验可以成为文学经验的书写材料，甚至也可以是最简单地被“创造”的经验。此教学主要以作家对食物的深情浸润到人生里，藉由书写饮食进而回味亲情乡情、品味饮食知识与社会文化，饱尝丰富的生命滋味。饮食是文学作品常见的内容。不同地域、时代的作家，同是通过对吃的描写，引发深刻感受，可从中体会不同的散文风格。

参考杜杜《饮食与艺术》（1998），作者借饮食，串连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电影有关食物的描写，引出无限故事和典故。而王良和《柚灯》（1991）的自序〈屋缘与灯情〉，了解作者的创作动机，并与另一篇同以柚为题的《碧柚》并读。王良和所描写的物是抽象的，寄寓作者对生命的体察和思考，而杜杜则实写西瓜，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欣赏。透过阅读杜杜《饮食与艺术》第六章的选篇〈炎夏永画吃西瓜〉与〈文学里的西瓜〉，导读王良和《观柚》及《孤柚》，了解两首诗中“柚”的含意。

城市物质丰富，香港文学作品，不少以寻常的物品作素材，透过对物的观察和细致描绘，呈现故事或曲折以表现作家的思想、情感。

4.2 “人物”教学构思

也斯（1949~2013）是香港文化的发言人，他的每一篇文章紧扣着香港这个殖民混杂都会的时空变化（Homi Bhabah, 1994: 页112）。“殖民混杂性”（colonial hybridity）正是殖民文化再现的问题基要，而殖民的权力，也正在于其产生混杂式文化再现的过程及效果。迁移界线下的思考，很多时穿梭在国际故事和民族故事以显现都市文化的特殊存在。也斯文化评论的特色是在凝视香港的同时，也溶入对外国文化的观察体验，他以观照的方式，而且是感性的、真挚的深入透彻当前实际，并将香港文化安置在历史的大背景底下论述，即有远瞻，也不失反思，符合香港文学文化的特殊性。

人物和城市的关系千丝万缕，加上香港人身份认同的复杂性，一方面感到殖民地身份或香港人身份有意无意之间即将消失，于是唤醒了香港人的本土意识，在历史怀旧之中重构香港人身份。另一方面长期生活在惶惑与压抑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来自内地政经民生影响的焦虑，使香港人感到身份的不确定，所以导致香港意识的空前膨胀。显然，八九十年代香港小说的本土意识增强，某意义上虽促进了文化认同及身份追寻，但对祖国大地既爱又恨之情，使香港人趋之若鹜，这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时代的政治文化焦点。也斯的城市观察这时着重关注城市发展的同时，生活于其中的人们行为，透过对人物角色细致的表达出来。有学者认为“也斯偏爱细致、被忽略的、日常生活的、或者本土的……这些边缘角度作为观察世界的角度。”（黄静，2003：页40）也斯《城市笔记》中的〈看电视〉及〈卖木屐的老人〉作品中，可以探讨作者和这个城市的关系。〈看

电视》中，把孩子看电视得入神的情景以特有的揉合真实与虚幻的手法书写，既有距离地写出孩子的神情，同时潜入孩子内心，写出其中的惊疑与好奇。《卖木屐的老人》则以平实笔触写出一位老人家的生活年代与现代社会距离。也斯善长透过街道形形色色生活的市民，掌握他们日常千篇一律，不为人注意的琐细且有人情的香港味道。

香港文化人陈冠中（1952~）的某些小说，也适宜作为人物教学，他本身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他创刊的杂志《号外》，强调远离政治，不反殖，配合当时港英政府的政策，促进“香港认同”、增强对香港的归属感。《号外》少谈时事、少谈社会改革，多谈普及文化——时装、品味、潮流、名人、电影、电视、流行曲、消费、女人心态，甚至赛马等。《号外》最大的特色，是把当年开始城市化的香港中产生活“魅力化”（glamourisation）。在语文上最能突显这个特色的是《号外》中、英、粤语夹杂的说话及文体。六七十年代的本土派是番书仔（受西方教育）出身，国学基础不如老一辈，不能不借助英文。况且，要书写评论普及文化、城市潮流，亦不能不借助外语。通俗的报刊文化版也对他卖账，官方办的文化研讨会也偶尔会找他去发言。

陈冠中发展了《号外》的“百厌”文体，他于1976年与友人创办香港文化杂志《号外》，配合熟悉影坛新旧事的邓小宇、充满创意又有不少点子的胡君毅，后来再加上博览群书的丘世文，创造出一种顽皮又世故、势利又天真的号外文体。陈冠中以他七十年代在波士顿读新闻学时接触到流行的新新闻体的影响，先以简洁文笔、细查资料、耐心问答，写出个人风格的采访专题：如赞育医院输错血、美沙酮戒毒、珍宝舫大火、恐怖的幼儿园、和谐式飞机等港式新新闻报道范例。（也斯，2012：页137）

陈冠中曾一度投入电影事业。由他以写小说形式看城市老练的人情世故，最是恰当。也斯认为在文化与小说之间，陈冠中的小说既是从对实况人情的观察而来，他亦是把人放在具体的处境中，面对暧昧的道德伦理处境去思考人的可能与限制。例如于2007年推出的《香港三部曲》短篇小说集，写的是唐番交杂的婴儿潮世代，五十年代横空出世，六十年代孵长，七十年代登场，担大旗演义新香港大戏，三个主角都是彻彻底底的香港人。作者陈冠中以传统的言情故事，老练的人情世故去写某一角香港的深层心理。

《香港三部曲》中的第二篇小说《什么都没有发生》以第一人称叙事，写人物张得志回首前尘往事，看自己如何逐渐成长为香港制造的现代专业人生，帮不同背景的老板打天下，永远是第二把手，理性处理问题，不管正邪生意，总进场把事情办好，然后全身而退。也斯在文章中表示陈冠中的背景令他对这人物的生活和交往圈子非常熟悉，他用一种亲切冷静而实事求是的态度写来，很容易令批判性的论者觉得政治不正确、意识有问题。有趣的却正在作者爽快文明略见自得的自叙中往往也包含了自嘲，有时甚至安排在叙事里流露出叙事者不觉的反讽。（也斯，2012：页139）

小说需要一定的对人情的了解，不光是讲道理，有人物可容纳庞杂人生，加上文字艺术，是入世的艺术，尽管陈冠中写的是通俗的言情故事。

五 结论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世序”，文学反映时代、城市的现代化发展，在香港作品都有不同形式的反映。透过作品中不同阶层人物的描写，可以体会城市不同层面的变化，了解作者的情感和态度。

香港作为一个身世暧昧的城市，因为其历史和文化背景来源甚多，含混模糊。虽然殖民与被殖民数十年，形成语言夹杂，文化混杂，香港文学定义颇为复杂，但也不阻碍“香港文学”作为新领域和新科目，而今成为大学课程内一个热门科目。因为香港文化身份的隐喻，这集反叛、边缘、游离于一身的混杂局面，是“香港文学”散步实践赖以支持的文化含量。有了这个行走于城市的意义，我们才发现城市背后是香港故事错综复杂，难以满足讲述的尴尬。

参考文献

班雅明著，张旭东、魏文生译（2010）《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论波特莱尔》，台北：脸谱出版。

董启章（2018）对倒·时代，香港明报《明周文化》，6月28日。

杜杜（1998）《饮食与艺术》，香港：明窗出版社。

韩丽珠（2019）城市的皮肤，《明报》副刊，8月14日。

黄继持、卢玮銮、郑树森合编（1998）《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

黄静（2003）都市的观察者——也斯，《香江文坛》，16，40-46。

黄维梁（1996）《香港文学再探》，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

Homi Bhabha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刘绍铭（1995）《香港因缘》，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卢玮銮编（1998）《叶灵凤书话》，北京：北京出版社。

王良和（1991）《柚灯》，香港：诗双月刊出版社。

小思（2009）《香港文学散步》修订版，香港：商务印书馆。

也斯（2012）《城与文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